

THE TRUTH OF DEMOCRACY

Song Luzheng's Political Observation

民主的真相

宋鲁郑时政观察笔记

宋鲁郑 著

红旗出版社

民主的真相

宋鲁郑时政观察笔记

宋鲁郑◎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的真相: 宋鲁郑时政观察笔记 / 宋鲁郑著.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51-3855-1

I. ①民… II. ①宋…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0771号

书 名 民主的真相: 宋鲁郑时政观察笔记
著 者 宋鲁郑

出 品 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张景涛 朱小玲
总 监 制	李仁国	责任编辑	朱小玲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18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57274497
E - 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57270296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5727462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7年3月北京第1版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3855-1	定 价 36.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政治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中国经济的成功已被全球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这种奇迹也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和思想外溢效应：一是世界开始反思甚至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失灵和局限性。二是一国的发展包括政治发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路。在这个历史理性反思的大潮中，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是十分突出的一位。

多年来，他凭借长期对西方内部的深入观察和细致了解，以及国内长达十年的体制内工作经验，以少有的高产、犀利的文风、独特的视角、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不仅对西方制度模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解剖，同时也对中国道路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总结，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宋鲁郑一向服膺严复的名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可谓抓住了一国制度产生和演变的核心。在他第四本文集出版之际，我也借用自己的一篇文章为之作序。此文是我十年前对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心得，今天读来也站得住脚，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宋鲁郑观点的呼应，核心就是：政治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遇见西班牙前外长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

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书《中国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

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工业能力之和，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作是“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地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做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尔

洛（Julie Barlow）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还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结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

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8）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贾雷德·戴蒙德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不尽如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

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 30 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 1 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 30 多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不少方面也超过了西方国家：美国 2005 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 2008 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 2003 年 8 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 1 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竟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

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50%，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所谓只要制度好，傻瓜也可以治国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适用，更不

要说非西方国家了。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选，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

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在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可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

甚至瘫痪。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市场和计划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

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如果说30多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是为序。

张维为

2016年8月28日于静远湖畔

目 录

序 言 政治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张维为 1
-----------------------	-------

第一篇 西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

谁应该为美国枪击案负责？	3
斯诺登为何“背叛”西式民主？	9
美国为什么会发生“民主”保卫战？	15
谁应该为伦敦“骚乱”负责？	19
德国大选人民做主了吗？	25
好民主，坏民主：萨科齐背后的西式民主	31
西班牙危机中的民主真相是什么？	39
西方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吗？	45
西方模式为何导致人才逆向淘汰？	63

第二篇 西式民主输入国还好吗？

西式民主下的印度	73
民主之后的突尼斯	79
谁在掌控叙利亚？	83
利比亚为什么避不开“民主魔咒”？	87
埃及民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93

乌克兰悲剧之后的大国博弈..... 98

缅甸的民主试验能成功吗? 104

中东民主化为什么会遭到美国的反对? 110

第三篇 中国式民主进程为何没有榜样?

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为什么没有榜样? 117

中国的政治自信从何而来? 124

为什么说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157

第四篇 为什么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何如此尴尬? 173

“独裁者”李光耀：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 176

发展中国家能跳出“民主陷阱”吗? 183

西式民主能够化解中国的困局吗? 189

为什么不能用西式民主来评价中国式民主? 201

为什么说告别文化浪漫主义才是中国之幸? 204

第一篇

西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